

# 论张仲景的医疗实践

朱 鸿 铭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医学家。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他以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指导，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创立了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中医学术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同儒家唯心论作斗争中创造性地总结出优秀的临床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秦汉以后，中国医药学已成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张仲景的著作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批林批孔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和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医疗卫生战线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革命景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医学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评价张仲景和他的著作，进一步发挥医学科学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战斗作用。

## (一)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张仲景的医学成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产物，与当时法家的政治路线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政权崩溃的时代。公元一八四年爆发了黄巾军起义，其势如疾风暴雨，迅猛异常。经过这次革命战争的荡涤，东汉王朝威风扫地，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世族豪强相互兼并，混战不休，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残。除了社会政治原因以外，又遇上大旱灾，造成了疾病广泛流行，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村的严重破产，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sup>①</sup>，“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殒，或复族而丧”<sup>②</sup>，正是当时疾病流行的真实写照。仅以张仲景家族为例，从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以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全族中就因疾疫死亡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占了十分之七。现实生活要求行医者发奋努力，深入地钻研医理，总结经验，解决疾病问题。而秦汉以来日益丰富的医药知识，也为进一步发展提高医药学准备了条件。

东汉初, 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 是一位著名的法家, 也是一个医家。他首先举起“非圣”的旗帜, 在《问孔》和《刺孟》的文章中, 锋芒所向, 直指孔孟, 并以元气自然论痛批了儒家“神学目的论”与谶纬迷信。他的《论衡》八十五篇, 不仅有关于医学的精辟论述, 而且对人体生理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分析, “死生者, 无象在天”<sup>③</sup>, “人之所以生者, 精气也, 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 血脉也。人死血脉竭, 竭而精气灭, 灭而形体朽, 朽而成灰土。”<sup>④</sup>“温气疫疠, 千户灭门, 如必有命, 何其秦齐等也。”<sup>⑤</sup>“吞药……能令人无病, 不能寿之为仙”<sup>⑥</sup>。为了反对和抵制反动儒家对医药学的渗透, 王充晚年还作《养性书》, 阐明讲究卫生, 调节饮食, 恰当用药的理论, 对医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思想, 对东汉时期的医学发展, 有着积极的影响。

和张仲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曹操, 是汉魏之际的法家的杰出代表。曹操认为“天地间, 人为贵。”<sup>⑦</sup>人若用法家的思想武装起来,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 去与自然作斗争, 就能无往而不胜。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秦到西汉初儒法斗争之后的又一次新高潮, 法家路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这些都促进了医学的新发展。张仲景在当时的革新前进, 反对有神论及天命观的法家思想影响下, 认真总结先秦以来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 通过在临床上反复验证并进行细心的观察, 辨别各种疾病的证候和发展规律, 坚持前进, 敢于革新, 终于写成《伤寒杂病论》, 成为在医学上作出卓越贡献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医学家。

## (二)

正是在法家路线的指导下, 张仲景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大胆进行医疗实践和创新, 才取得了医学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成就。

农民起义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豪门大族, 又加上当时大疫流行, 他们感到死亡的恐惧, 于是求仙、访道, 炼丹、服石, 想尽种种办法, 寻求长生不老的法术, 结果全都以失败而告终。张仲景对这些人给予无情地抨击: “怪当今居世之士, 曾不留神医药, 精究方术”<sup>⑧</sup>, 他对孔孟之徒跟在豪门贵族后面, 追逐个人名利的虚荣权势, 不顾人民死活, 表示极大义愤: “竞逐荣势, 企踵权豪, 孜孜汲汲, 唯名利是务”<sup>⑨</sup>。这些人一旦得了不寻常的疾病, “而方震栗, 降志屈节, 钦望巫祝, 告穷归天, 束手受败”<sup>⑩</sup>, 张仲景明确提出了巫祝治不了病, 也救不了命, 这种无神论思想, 是对儒家有神论和天命观一个有力的批判。他还指出: “厥身已毙, 神明消灭, 变为异物”<sup>⑪</sup>, 这富有战斗性的批判, 同东汉初法家王充的论述是一致的。

张仲景注重实践, 反对守旧, 力主革新, 对当时一些守旧的医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观今之医……各承家技, 始终顺旧, 省疾问病, 务在口给, 相对斯须, 便处汤药。”<sup>⑫</sup>在法家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影响下, 张仲景决心致力于医学的革新, 他不但认真钻研《素问》, 《九卷》, 《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 《胎产药录》, 《平脉辨证》等理论, 勤于总结先秦以来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和医学成就, 还认真地广泛地学习、吸取群众中的先进经验, 收集民间单方、验方, “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sup>⑬</sup>, 他结合当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 付诸大量的临床实践, 创造性地提

出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比较系统的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内经》以来的“辨证施治”规律,使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诊断、治疗密切的结合起来。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实践论》)。正是由于坚持长时期的医疗实践,使张仲景的医学理论不仅闪现着鲜明的唯物论色彩,而且已经开始探知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预防、治疗的某些规律,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的内容。他通过临床实际的观察,将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的情况进行分析、辨别、充分认识,从而寻找出疾病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和疾病每一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这就是所谓“辨证”。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根据。根据辨证的结果——正确的诊断,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即所谓“论治”。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对辨证是否正确的检验。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全过程。

张仲景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概括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类病证,用以说明病变部位,性质,正邪的盛衰,病势的趋向,以及六类病证之间的转变关系。从病变部位分,太阳病主表,阳明病主里,少阳病主半表半里,三阴病统属于里。从病变的性质与邪正的关系分,三阳病多热多实;三阴病多寒多虚。六经病证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二经或三经的病证合并出现。二经或三经的病证同时出现的叫“合病”。一经之病证未罢,另一经证候又见,两经交并而病,有先后次第之不同的叫“并病”。六经病证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有机联系,并且互相转变。由这一经转变另一经病的叫做“传经”。六经病证的治则是,三阳病重在祛邪,三阴病重在扶正。

六经分证的内容,都可以用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明。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得来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找出疾病的属性,所在部位,病态表现,正邪消长。八纲把疾病的证候,分为表证与里证,寒证与热证,虚证与实证,阳证与阴证这四个对立面,成为四对纲领,用以指导临床治疗。其中阴阳这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可以概括说明人体一切生理、病理现象,又可以概括其他六纲,即表、热、实证为阳;里、虚、寒证为阴,所以阴阳又是八纲中的总纲,是辨证的纲领和根本。八纲辨证在临床上又起着执简驭繁的作用。张仲景针对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在治疗上相应地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治疗大法。仲景运用治法的原则,有严格的规律性,同时也有很大的灵活性,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去指导临床治疗。靠熟练的辨证功夫,去准确地抓主要矛盾;靠治疗原则的灵活运用,去正确处理现象和本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伤寒论》第十一条指出:“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张仲景不但为我们指出如何判断疾病的阴阳属性,辨别寒热的真假,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辨证在诊断上的重要意义,启发我们在临床时如能掌握运用这一辨证原则,即使遇到寒热真假混淆的时候,也能当机立断,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同的疾病,由于机体反应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证候,治疗方法也就不同,叫做“同病异治”。不同的疾病,在病变过程中,出现了相同的证候,其病理是相同的,可以采用同样的治法,叫做“异病同治”。以“黄疸”病为例,根据病人虚实寒热的

不同,张仲景就采用了汗、吐、下、温、清、补、利小便等七种治法,选用茵陈蒿汤、栀子大黄汤、茵陈五苓散、硝石矾石散、大黄硝石汤、小半夏汤、小柴胡汤、小建中汤、桂枝加黄芪汤等。与此相反,对于消渴病(包括糖尿病等)、虚劳腰痛、转胞(产后尿潴留)、肾虚脚气病等,张仲景均以肾气丸治疗。这就是一病可用多方,一方可治多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不仅反对鬼神观念,坚持唯物论的自然观点,而且认识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是与其医疗实践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张仲景的著作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医学理论与临床治疗有机结合。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实践论》)。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都来自实践。实践得多,经验就多,认识就深。《伤寒杂病论》全书共十六卷,到宋代才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金匱要略》以脏腑论杂病,用脏腑病机的理论进行证候分类,并论述了三种不同的病因与杂病发病的关系,对病因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仲景对方剂学上的贡献在于奠定了我国方剂学的基础。《内经》载方十三首,《伤寒论》已发展为一百一十三首,在《金匱要略》中发展为二百六十二首,使用药物达二一四种之多。并以辨证理论统括方剂,其中大多数方剂,经过长期实践的考验被沿用到现在。方剂法度谨严,主辅佐使配合得当,在熟练掌握药物性能的基础上,用药准确。从辨证得出的准确诊断,采取恰当的治疗方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治疗的效果又是检验辨证正确与否的标准。六经辨证论治中提出的理、法、方、药,现仍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从而得到了历史的验证。这是张仲景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最突出的特点。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方剂的变化上看出,当年张仲景通过实践发展医学理论的痕迹,如芍药与甘草相配合,叫芍药甘草汤,可治腹痛,再加上桂枝、生姜、大枣,就变成辛温解表、调和营卫的桂枝汤了。

以桂枝汤为例,主药桂枝辛温,辛能发散,解表发汗,温通卫阳,温筋通脉,解肌表而通阳气,是一种解表药。辅药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阴营,敛阴和营,固腠理,和血脉,收阴气,缓中止痛,是一种和里药。这两味药配伍应用,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意,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使桂枝辛散风寒而不致伤阴,利用它们的一散一收,而使表邪得解,里气以和。生姜味辛,佐桂枝以辛散卫分表邪并开胃,大枣味甘,助桂、芍而和营血,佐芍药、甘草以和中缓急。姜枣配合,又加强桂、芍调和营卫之功,共为佐药。甘草甘平,和中气,通经脉,利血气,调和表里,调和诸药,是为使药。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服药后吃少量热稀粥,以助药力,既可以和胃气,又可有津液的补给。冬季须盖被保暖,使出微汗,不可出汗太多,免得伤阳损阴。桂枝汤是张仲景书中第一方,从它加减演变而成的方剂比较多,其用途也极为广泛。

《伤寒论》在因证立法,以法系方,以及遣方用药方面,已有了比较完备的方剂学知识。在剂型种类上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肛门栓剂、灌肠剂、酒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软膏剂、阴道栓剂等十三种之多,很多方剂都是久经实践的考验直到目前仍然是常用有效的。

在公元三世纪初叶，张仲景就创造了人工呼吸法，事实证明我国古代医学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是遥遥领先于西方的。

### (三)

作为古代医学家的张仲景，不愧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临床实践家，他的思想主流是前进革新的法家思想。正因为这样，遭到了饱受汉儒思想熏陶的范曄所遗弃，而不载入《后汉书》。但是，张仲景唯物主义的业绩是抹杀不掉的。掩盖不住，于是就加以歪曲。后世的儒医一派，为了儒家的利益，硬把张仲景打扮成“本于神农、黄帝”的“医圣”，给他围上了“经方”的藩篱，把张仲景尊为“医中之圣”。

清代儒医竟认为：古今医家莫过于仲景，温病不能越出“伤寒”，甚至大骂温病学派是“离经叛道，党同妒真”，竭力兜售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公开否定张仲景的医疗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甚至说张仲景的著作“其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所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其药悉本于神农本经，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sup>④</sup>医学根本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不是医学家总结的，而是“圣人”的先知先觉。“经方”“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任何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都是对唯心主义的具体揭露和批判。因此，儒家歪曲张仲景的目的，实质上是维护其反动的政治路线、认识路线，维护其反动统治。

张仲景的巨大贡献，是他在大量医疗实践中收集、总结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经验，加以提高形成的，绝不是什么神明的启示，天才的创造。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张仲景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医药学家，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彻底的。张仲景的足迹所至不过荆楚一带，他的所见所闻毕竟要受到时代和地域的限制。他的《伤寒论》虽然有很大的价值，但不能把它视为万能，不能认为完备无缺，它不可能包罗一切而绝无遗漏，而是有待于随着医学的发展而提高，温病学说就是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医学中传染病学的内容的。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已不能满足所有外感热病的需要，特别是初起即以邪热为主证的一类温病更不相适应。清代医家叶天士又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法，开拓了用卫气营血辨治温热病的先河。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法，与六经、卫气营血相互为用，彼此取长补短，并存不悖。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发展，八法已不能完全概括临床常用方药。为了适应治疗的需要，清代《医方集解》根据方剂的不同功效，又分为二十二类（法）。时代在演变，人类在发展，疾病在变化，治法也必须不断的发展和充实。

东汉的统治阶级把孔孟之道越捧越高，“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当时的张仲景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他的《伤寒论·自序》中，就引用了孔丘“生而知之者上”的反动谬论。书中引用了阴阳术数，以“阳七阴六”来论述治疗疾病的规律，这种理论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自序》中还有“上以疗君亲之疾”的记载，在分析如何预防疾病时所提出的“更能无犯王法”<sup>⑮</sup>，这些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上说话的。还有《金匱要略》杂疗禁忌等方面一些不合理之处，应当批判地接受。

现在卫生战线上，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要贯彻毛主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坚持革新，反对保守，对前人经验既要继承发扬，又要突破创新，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使医学不断前进。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医药学这座伟大的宝库，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及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逐步积累和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亿万人民防治疾病的经验，汇成了医学发展的长河。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医药学发展的唯一源泉。张仲景重视实践，接近群众，积累了大量的防病治病知识，把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认识加以发展和提高，才作出了他的发明和创造。我们要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到人民群众这个医药知识最广阔、最丰富、最基本的源泉中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学习群众的发明创造，总结群众的丰富经验，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广大赤脚医生在寻找新药，创造新方，改革剂型等方面，都获得巨大的新成果。特别是赤脚医生的实践活动，发明创造，更值得重视。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开展卫生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贡献力量。

注：

- ① 《曹操集·诗集·蒿里》第四页，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
- ② 曹植：《说疫气》。
- ③⑤ 《论衡·命义篇》。
- ④ 《论衡·论死篇》。
- ⑥ 《论衡·道虚篇》。
- ⑦ 《曹操集·诗集·度关山》第三页，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
- ⑧⑨⑩⑪⑫⑬ 《伤寒论·自序》，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年。
- ⑭ 陈修园：《医学三字经》卷之一，第二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年。
- ⑮ 《金匱要略方论》卷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第一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1963年。

## 更 正

- ① 《文史哲》1975年第一期第24页第18行“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应为“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 ② 同上第93页第10行“违纪”应为“违纪”。
- ③ 《文史哲》1975年第二期第89页倒数第13行“辽太祖五年（920年）”，应为“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年）”。